

一位教育厅长“追赶时间”的改革

本报记者 吉祥



中、高考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远,罗崇敏在此时再次“发飙”。

5月4日,这位云南省教育厅长在西南大学演讲时,直指“高三和初三都是在浪费时间”。

这已经是罗崇敏履职云南教育厅长的第五个年头,云南关于中、高考的改革一直在如火如荼地推行。

从红河改革到云南教育改革,这位今年正式步入花甲之年的正厅级干部,一直在“奇官”的冠冕下争议声不断。

他的教育改革不断被高层和民间反对,却总能在争议中成功突围;他愿意接受本报记者给予的“倔强”的评价,却婉拒“聪明的改革者”的标签;他深谙官场逻辑和生存之道,却又特立独行,孤零零一个人走在前面……5月17日,记者与罗崇敏云南相见,一席长谈给记者留下一个更为矛盾和复杂的改革者形象。

“又不是第一次了”

5月4日在西南大学的“发飙”,对罗崇敏来说已经是常事。

演讲结束后,全国各地的记者涌向他的办公室。在一次利用他开会间隙安排的发布会上,一位外省记者追问:“罗厅长,网上曝的您在西南大学的演讲都是原话吗?”旁边昆明一家媒体记者代为回答:“别人说这话是发飙,他这么说很正常,又不是第一次了。”

媒体描述中,作为云南教育厅长的罗崇敏第一次“发飙”,是在其履新不久后的全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上。当时罗崇敏刚跑完全省八州、八市的多所学校,他每次走进教室,看到的不是活泼可爱的孩子,而是铺天盖地的书,桌上是厚厚的书,桌子下面还是厚厚的书,更让他难受的是,一个一年级小学生竟然在上午放学时,带回了老师布置的120

道题目,而且下午就要交。

“从毛主席、周总理就开始谈减负,怎么谈了这么多年,还是没进展?”会上,罗崇敏拍起了桌子。“会上讲素质教育牛气冲天,行动上搞素质教育气息奄奄,这个一定要改。”

在红河州时,作为“一把手”的罗崇敏做事喜欢直接“动真格”的,这次也是,“刀”直接砍向了校长们,行动上搞素质教育气息奄奄,这个一定要改。”

在教育厅内,也让他揪了个“底朝天”,55岁以上处级干部全部卸任,全厅处级、副处级干部公开竞聘;云南省10个院校的党委书记、校长职级向社会公开选拔……

教育厅大大小小的官员,以及云南大大小小学校的校长们在第一时间明白,他们必须赶紧学会如何与这位“奇官”罗崇敏相处。

罗崇敏从不用秘书代笔,4年多时间,他出版了3本教育专著;所

有讲话稿均亲自操刀,即使写到深夜也不会让秘书代劳。

下去调研时,喜欢将“引领”挂在嘴边的罗崇敏,总是步履匆匆地走在队伍前头。“厅长吃饭特别快,吃了10分钟就放下筷子。”一位女下属告诉记者,只要饭桌上有罗崇敏,大家都会赶紧吃。

他走路也快,在下乡调研的多张照片中,他总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最前面。

于是大家很快了解和适应了这位厅长的个性和速度。

就在几天前,罗崇敏找来云南省内10所优质高中的校长,告诫校长们今年录取学生时不能以分数论,要综合考察,“如果发现谁只凭分数录取学生,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。”

罗崇敏希望通过这一措施,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,减轻他们的负担,可一切并未如罗崇敏所料,新出现的学业水平考试一共要考13门,而原本的中考却只有7门,学生和家

长干部会积极迎合新领导的风格。“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,罗崇敏这样告诉记者。

“不汇报”的智慧

中考在即,高中中校长虽被他稳住了,但他的微博上,还是经常有考生和家长谩骂宣泄。

2009年10月,罗崇敏酝酿已久的中考改革方案出炉:取消云南省统一中考,高中录取引入新的评价方式,用学生在校3年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,“将一次考试变为多次”。

罗崇敏希望通过这一措施,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,减轻他们的负担,可一切并未如罗崇敏所料,新出现的学业水平考试一共要考13门,而原本的中考却只有7门,学生和家

长认为“改来改去,学生的负担更重了”。甚至有人将他的改革戏称为“中考加强版”,而家长也担

心,罗厅长的改革将导致一场“拼爹游戏”。

上面也有人不断提出异议。一切又像回到了红河州那会儿,下面不理解,上面也不理解,只是那时候,他是州委书记,权力要大得多,不需要事事提前汇报。

罗崇敏也不急于解释,他很认真地告诉领导:“有想法问题不大,这些我都说过了。”

后来,罗崇敏按计划发通知,基本普及13年教育试点顺利在云南33个县(市、区)推广。回看这一事情的经过,罗崇敏承认,他的做法“肯定会让领导产生想法”。

他对政策的把握能力应该与其秘书经历有关。“云南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分析,罗崇敏大学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秘专业,此后又有过多年的办公室工作经历。

另一个关于罗崇敏的传说是,地方履职期间,罗崇敏有过一天接待3位中央不同部委领导的经历,每一个都能接待得很好,这位官员据此表示,他们的厅长并不仅仅是外界流传的激进改革者,他很注重权衡各方关系为其改革所用。

一个数字可以说明,罗崇敏为了发展云南民办教育,多方“化缘”,这些年经他引人的社会办学资金就有数亿元,罗崇敏为此得名“招商厅长”。

为了在财政困难的云南完成校舍危房改造,他更是积极求助高层。罗崇敏曾上书温家宝总理寻求支持,两会期间打断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陈述困难,最终为云南争取到中央的财政支持,“这几年中央重大教育项目安排,100块钱中有10块分给云南,云南4年完成了2000万平米的校舍改造”。

罗崇敏承认,4年间完成多项既定改革目标,除了需要做实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动高层外,也需要“那点能力那点智慧”。

罗崇敏承认,4年间完成多项既定改革目标,除了需要做实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动高层外,也需要“那点能力那点智慧”。

罗崇敏承认,4年间完成多项既定改革目标,除了需要做实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动高层外,也需要“那点能力那点智慧”。

罗崇敏承认,4年间完成多项既定改革目标,除了需要做实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动高层外,也需要“那点能力那点智慧”。

等具体措施,还有他最自豪的“三生教育”,目前被评价为效果最好,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生根发芽。

此时的罗崇敏一改在红河时的低调,开始频繁接受媒体采访,他的一些改革理念开始面对公众提及。

其中一条他至今信奉的理念是:改革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,甚至在红河改革时违背了一些法律法规,但只要不产生社会震荡,都是可以去做的。

罗崇敏说,如今社会大环境对改革者越发宽容,而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改革者有没有魄力、能力、智慧去推进改革。

罗崇敏毫不讳言,为了推动改革,有时需要一点“人治”。任教育厅长期间,虽没了主政红河时号令一方的施政便利,但一些“特事特办”的改革举措仍然不时冒出来。

昆明出租车司机雁雁对本报记者讲,他的孩子将要报考的云南农大附中,就是罗崇敏去年利用开学前的一小段时间,从山东引入昌乐二中资源联合创办的,其雷厉风行可见一斑。

“十几天办起一所学校,当时大家都认为不可能。”在记者向罗崇敏求证此事时,罗崇敏也很慎重,他拿起铅笔,轻轻地在纸上敲了几下,“此事还是不提为好。”

多年推行改革的现实,已经教会了罗崇敏如何回避困难,又如何

在困难中继续前进。

比如,他曾希望对云南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,但随即带来教师身份脱离体制的问题,改革最终没能进行下去。

另一个改革是关于在大学里施行董事长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,他虽反复博弈,但还是没能推行,几乎所有人都告诉他,“你这个不现实。”

罗崇敏承认,4年间完成多项既定改革目标,除了需要做实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动高层外,也需要“那点能力那点智慧”。

对于已经60岁的罗崇敏来说,留给他的改革时间不会太多了,他想到“前无古人”,就不能再轻易放弃一些事情。

在《云南省中长期教育规划和发展规划纲要》里,罗崇敏的“三生教育”理念、中高考改革、民办教育发展等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,但罗崇敏表示,这并非他为未来云南教育改革进行布局,“虽然纲要写了这些东西,但不要想着后来者会这样办,除非我是普京。”

在近两年接受采访时,经常有媒体问及他在红河改革的一些得失,但他却总表示自己不喜欢怀旧,不愿过多谈及,他好写字,至今已出书18部,却没有一部关于自身改革的梳理与总结,原因仍是“不喜欢回头”。

但在5月17日与本报记者的长谈中,他意外提到了红河,“我不指望马上就见到效果,包括我在红河提出的卫生体制改革,文化体制改革,很多地方都来学习借鉴,但恰恰相反,红河州不用了。”

罗崇敏相信,“我所推行的改革措施,都有它今后借鉴的价值,这点我从不怀疑。”

很少有人理解他,红河的老部下在他离开多年后依然不理解;至于云南,他似乎已不再奢求大家理解。

5月17日,在他发起召开的现代教育发展大会上,罗崇敏再提教育改革,这个少年时差点饿死、30岁读初中,38岁才成为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厅长,谈到自己在教育领域推动的改革,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:教育,我来过,我改变过。

“我现在很孤独”,罗崇敏曾这样说,但他接着说,“我的理想就是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。具体讲,就是在每一个岗位上做事,我都会想着超越别人,超越前人,我可以做前无古人的事情,但做不了后来者的事情。”

罗崇敏承认,4年间完成多项既定改革目标,除了需要做实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动高层外,也需要“那点能力那点智慧”。

凯特:母亲的100个愿望

这是一个普通母亲的临终愿望。

英国母亲凯特·格林患上癌症后,在临终前向丈夫森哲·格林讲述了100个愿望,希望他可以和孩子共同完成。



这些愿望很简单,小到每晚亲吻孩子两次,大到敦促丈夫重新找一位妻子,丈夫把这些愿望都记下来,并取名《妈妈的清单:一名母亲留给丈夫和儿子们的一生课程》。

如今这份“清单”已经成为英国最畅销的书。

凯特曾希望森哲和孩子们可以绕着一座博物馆滑冰,于是森哲带着孩子们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溜冰,而“他们为我们特别关闭了博物馆”。

想必森哲和孩子们会活得很安心,因为会有那么多愿望等待他们会去实现,天空的凯特也会很安心,因为她用“留下愿望”的方式达成了自己的愿望:我走了,但我们还是在一起。

外公:“走”遍世界的愿望

几天前,北京女孩凌一凡的一条微博,帮外公完成了一次“奇特”的旅行。

她的外公86岁,癌症晚期,老人是一位高级工程师,但一辈子没出过国,也很少旅游。于是,凌一凡画了一幅外公的漫画,贴在微博上,并说出她的愿望:希望网友带着外公的画像,在世界各地留影,用这种方式“却外公最后的遗憾”。

凌一凡和外公都没想到,他们的愿望竟然非常“容易”地实现了:很快,世界各地的网友给她传回上万张照片,每张照片上都有外公的漫画像。

原来,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任何飞行器都快,那就是“爱”,许多人的爱,可以在瞬间把一个“不可能”的愿望变成“可能”。

乐嘉:虚拟中让人“泪奔”的愿望

5月16日凌晨,《非诚勿扰》著名主持人乐嘉发在推特上的一篇长博文(写给15岁的女儿),让众多网友看得“泪奔”。



文章里,乐嘉以一个正在过37岁生日的父亲身份,跟女儿聊恋爱、做人、学习、阅读等问题。文中少有犀利、调侃的言辞,只有一个父亲对15岁早恋女儿的担心和愿望,但这些愿望,却让人“刚读前两段就眼眶发热”。

第二天,网上就有人辟谣,说37岁的乐嘉至今仍是单身,从未听说他有女儿,但这并没影响人们阅读这篇博文的感动——也许对乐嘉来说,那个在深夜微博上偶尔展示出的男儿的细腻情怀,比起白日里风光无限的主持人更能打动人心。

汪洋:“仆人们”的愿望

近日,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每一次讲话,几乎都会成为网络热点。

5月18日,再次当选委书记的汪洋,在广东省十一届一中全会会上作报告时,提到“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”,结果第二天,全国媒体不约而同从上万字的报告中,“敏锐”地发现了这句话,并以此作为大标题,广为流传。

没过几日,汪洋在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,面对网友的批评,汪洋称:“我们是公仆,主人说仆人们好像也有合理性”。

第二天,这句话再次“脱颖而出”,被媒体和网民摆在了最显眼的位上。

想来,这些话之所以被眼睛雪亮的“仆人”一把抓住,是因为汪洋正好说出了“仆人”的愿望。

文/张洪波



王海:还是只想自在为“刁民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任鹏

并非“偶然”的登场

最近,王海仍在打官司。这次他告的公司是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,王海指责对方添加的荧光增白剂“致癌”,侵害消费者知情权,而蓝月亮也没有被动挨打,迅速组织人马反击。

一个月前,王海刚把红牛公司告上法庭,认为公司把饮料的药监局审批文件中的“食用方法及食用量”改为“饮用方法”。

发现某个企业的小过错,哪怕是产品中一处不起眼的问题,王海都会习惯性提起诉讼。

现在,无论王海打多么大的官司,对手是多么出名的公司,都已很难引起公众的兴趣。

这可不像王海刚“出山”那会儿了。时过境迁,改变的不光是时间,还有环境、方式,以及人们的思想。

购买两副索尼耳机走上打假

之路的故事,早些年被媒体讲述了很多遍。

但一个偶然,如果遇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而生根发芽,那这一切就不是偶然。

王海出现在1995年就并非偶然。

“那个年代刚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,市场一下子放开了,产生了诸多商品质量问题。”王海提供了一组数字:1993至1995年查获的假冒伪劣劣商品标值总额104亿元,这还不及假货实际存在量的二分之一。

幸好,1994年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49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: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。

王海开始登场。那个年代大部分人还没有及时唤醒维权意识,像王海那样理直气壮去索赔。

“20年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只会自认倒霉,和经营者理论都觉得心虚。”王海说,“1995年,中消协副秘书长武高汉说,大部分消费者



王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
买到假货都选择忍气吞声。”

甚至,王海“买假索赔”时,一度陷入“刁民”还是“打假英雄”,是守法还是道德自律的争议漩涡。

此时官方的支持及时出现,

中消协举办了“王海现象”研讨会,这个年轻人轰动全国,不经意间推动了“消法”的普及与落实。

至今,王海仍记得当时支持者有经济学家茅于軾、厉以宁和

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专家何山。

茅于軾评价王海:“智力水平、文化水平和个人修养都是中等的,但他能发现新问题,有勇气,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。”

王海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:民众的维权意识正在加强。

王海的名气度,甚至被1998年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注意到,并相邀见面。

如今,两人握手的照片被放在王海公司网站上,给公司运作添色不少。

王海记得,克林顿称他为“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”。

“消费者权益是人权的一部分,人权高于一切是美国的一种价值观。他不是冲着我个人,是对做这项工作的人有兴趣,这也是一种认可支持。”

说起17年来改变了什么,王海自信地脱口而出:“唤醒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,普通消费者变成了王海,随时能给自己讨公道。”(下转B07版)

渴望那块土壤,羡慕那种环境

——《那些年,他们一起追》结束语

文/本报记者 任鹏

1992年10月13日凌晨,有早起者发现,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,导师解万英不幸坠楼身亡。

五楼现场书桌上放着一本《求是》杂志,封面空白处,解万英生前写下:共产主义必定胜利。

前一天,是中共十四大召开首日。

在《交锋》一书中,人民日报高级编辑、作家凌志军对解万英之死做出假说:相信计划经济体制,对市场了解不多,曾撰文反对“私有制”引起社会不公的解万英,听到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空前绝望,以致不能自制……

“每当时代转换时刻,总有一些悲剧发生,总有一些新与旧的碰撞摩擦。”凌志军写道。

《交锋》记录了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。该书出版后,有外媒评价称:“改革派的胜利是时代潮流的力量,世易时移,人心所向,大势所趋。”

也许正是因为,社会是历史的缩影,而人,是社会的缩影。

一个国家的变化,也许在当时的年代体会不到什么,但在时间迁徙多年之后,再回头去看,也许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,我们已经走过很长的路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凌志军是那个动荡变革时代的记录者、观察者,以及之后的思考者。

在凌志军随后的几本书中,他的视角始终没离开过改革,他会选择某段历史的起伏和某个事件的样本,记录中国的进程、改革的延续,社会的变化,希望展现“中国的面貌”,让人们了解曾经发生的一切,从而得出自己独立的结论和答案。

尽管,这样的历史记录也许只展示了某个正面或侧面。

凌志军回想1990年后的十几年的中国,感慨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,在于这个国家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,在一代新人已经长大。

也许正是因为,社会是历史的缩影,而人,是社会的缩影。

也许正是因为,社会是历史的缩影,而人,是社会的缩影。